

一国两城:京港80后青年专业人士的境遇

吕道昱,王曦影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一国两制”承诺香港的政治体制50年不变,这50年是香港与北京不同政体的融合,也贯穿了80后一代人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段。运用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发现京港两地80后青年专业人士在工作、生活领域都面临着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常常选择辛勤工作的方式来克服“地位恐慌”。然而,京港两地专业人士对于是否给彼此带来竞争和威胁这一问题持不同观点,由于两地人才政策等因素,跨境工作人士难以融入当地生活。这些不同境遇的根源在于两地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差异。因此,京港双方应借助经济发展的平台,促进文化政治的交流和融合,以经济依存带动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关键词] 80后;青年专业人士;向上流动;文化认同;职业发展;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2)06-0078-11

北京人有时十分欣赏香港人的做事文化,所以才会出现香港人同化内地人。内地需要香港专业人士的介入和协助,彼此都需要互相适应。(HKH2:在京工作的香港人)

在我的行业里,其实内地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后方,我们主要的业务都是在内地寻求合作和拓展,市场和机会是巨大的。(BJC8:在港工作的北京人)

80后青年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群体。从广义上讲,京港80后青年处于相同的时代,同属于中华民族,但是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社会性质的城市,有着不一样的成长经历。北京80后被称为“改革开放的一代”,他们见证了民主政治的改革、市场经济的推行、多元文化的涌入、高等教育的扩张,见证了中国的日益崛起。2008年,随着80后在奥运火炬传递、汶川地震、奥运会志愿服务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突出表现,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从“垮掉的一代”转为“值得信任的一代”。香港80后青年是殖民地香港的最后一代。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香港回归成为既定事实,港英

政府大力推行政改方案,试图“为日后继续操纵和控制香港培植代理人”(峻焕,2004)。香港回归后,遭遇了“九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等巨大冲击,GDP增长速度被北京赶超。公民教育取代殖民教育,青年强烈需要香港本土文化来建构港人身份的主体性。香港社会从2009—2010年反高铁运动^①开始聚焦80后的故事。迈克尔·布雷克(1988)认为,每一代都必须完成适应自身所在年龄群体的文化背景,并创造出他们所接受的特殊亚文化。因此,京港两地青年对自身境遇的主观评价与两地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的强力塑造密切相关。

内地对80后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群体特征、产生因素、思想状况、消费方式、文化现象、社会交往、职场行为等领域(黄洪基,邓蕾,陈宁,陆焯,2009),试图让80后发出自己的声音,研究视角多为探析80后这一群体衍生的“蚁族”、“蜗居”、“闪婚”等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的成因。香港经历了近年的一连串文化保育、特别是2009年底的反高铁事件后,80后新世代和“新社会运动”成为了学界和舆论热烈探讨的话题(邹崇铭,2010)。香港学者对

[收稿日期] 2012-05-28

[通讯作者] 王曦影, E-mail: xiyingw@bnu.edu.cn

[基金项目] 香港智经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① 反高铁运动是为反对香港政府动用港币669亿公款兴建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的方案之人士于2009年末至2010年采取之一系列抗争行动之统称。

80 后的研究多透过 80 后参与反高铁、保育运动等社会运动解读他们对社会不满的根源。

丹尼尔·贝尔(1997)指出,到了后工业社会,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源,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专业技术人员开始处于主导地位。内地将专业技术人员作为一个阶层来研究始于陆学艺教授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毛哲山(2008)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专业技术阶层日益陷入经济压力过大、职业理性缺失、流动阻力明显的结构性困境。面对社会结构和资源占有状况的变动,专业技术阶层的发展呈现出话语权的增加、素质优化和职业素质的提升、促进社会稳定作用加强和阶层内部出现层化等趋势。随着 80 后青年专业人士逐渐跻身主流社会,专业技术阶层内部的分化不单体现在体制内外的区别(许叶萍,2008),同时以世代为标准,80 后专业人士与上一辈存在着许多差异,如理想信念的波动性,缺乏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抗击压力、挫折的能力不足等(于卫军,2008)。但从整体而言,内地学术界对 80 后专业人士的关注不足,未充分意识到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结构与青年发展的互动模式。反观香港,专业人士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吕大乐,2004)。于铭松(2010)总结这一阶层具有以下社会特性: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作为夹心阶层面临双重压力、总体受教育程度较发达国家不高使其面临“降级化”的困境、多元文化的影响决定其价值观的复杂性、脆弱的性格决定了其抗挫能力差。80 后专业人士与上一辈的特征差异受香港回归的影响。Li & Jowett 等人(1995)意识到这一问题,通过对专业人士的深度访谈,特别针对香港回归前的移民潮现象,发现民族认同是基于权力和地位,代表了一个人上升的机会。此外,近年的金融危机使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有学者认为香港中产阶级内部分层将在两个难度上出现分裂:其一,世代之间在待遇上的差距,演变为利益上的冲突和价值取向上的分歧;其二,内地与香港经济融合的不平衡将中产阶级一分为二,按事业与工作性质嵌于本地经济的程度区分,形成“在地型”与“流动型”的香港中产阶级(单光鼎,2008)。因此,有必要在内地和香港关系的背景下,研究 80 后京港两地青年专业人士的境遇。

作为内地社会文化发展的缩影和风向标,北京

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和科技中心,在“科技北京”这一城市功能定位的指导下,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专业技术阶层在北京社会阶层结构的比例是 19.23%,居全国之首。香港凭借先进的市场经济理念、管理模式,成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据 2011 年香港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专业人员比例占工作人口的 6.5%^①,专业技术阶层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强世功(2010)指出,随着内地经济的崛起,香港在经济上开始出现边缘化倾向,但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占据了民主、自由和法治话语的中心地带。这样一种中心与边缘、主体与补充之间的错位与反差是香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的问题所在。因此本研究试图了解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京港两地的 80 后青年专业人士面临的工作、生活境遇是怎样的?存在哪些异同?导致这种异同的社会文化历史原因是什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和香港三十会合作进行的一项关于京港青年专业人士工作生活状况的比较研究,采取了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参照国家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划分,本研究选取了较有代表性的五组职业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会计/金融、律师、科研人员、建筑/工程师、媒体/公关,覆盖了工科、文科、理科不同的学科背景。研究团队采取目的性抽样方法,运用焦点小组访谈的方式,在北京和香港各举行了 6 场座谈会,每小组人数为 6-11 人,除了职业划分,还外加一个跨境专业人士组别——即在京工作的香港青年专业人士和在港工作的内地青年专业人士。其中,在京的访谈中共有 44 名北京青年专业人士,其中男性 26 人,女性 18 人,平均年龄为 28 岁,平均工作年限为 4.5 年;跨境人士组别有 6 名香港青年专业人士,其中男性 3 人,女性 3 人。在港的访谈中共有 35 名香港青年专业人士,跨境人士组别有 8 名来自内地的青年专业人士。

此外,本研究还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问卷共有 15 题,以了解两地青年专业人士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北京的问卷发布在问卷星(www.sojump.com)的网站上,经过 1 个月的公开发布,共回收问卷 300

①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2001 年、2006 年及 2011 年按职业划分的工作人口. <http://www.census2011.gov.hk/tc/main-table/C104.html>

份,剔除了从业时间超过16年的样本数据,有效问卷为294份。香港的问卷共回收265份,同样删除

从业时间超过16年的样本,有效问卷为189份。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所示。

表1 问卷样本基本情况

	性别		年龄				
	男性	女性	25岁以下	25-30岁	31-35岁	36-40岁	40岁以上
北京	140	154	47	161	66	16	4
香港	117	72	9	62	53	50	15

焦点小组讨论主要是通过和参与者就其事业发展及障碍进行深入的讨论,藉以取得“质”方面的资料,而网上问卷调查则通过网络链接,收集“量”方面的数据,两种调查方法可以优势互补,既注重宏观状况的把握,又关注微观个体,探析这些现象产生的缘起,从而做出较全面和详细的分析。

为了保护研究参与者的隐私和权利,引文中的参与者的名字都用代码来进行匿名处理。所有代码都是由三个字母和一个数字组成,前两个字母是地区的代码,BJ表示在北京的访谈对象,HK表示在香港的访谈对象。第三个字母是访谈对象从事行业的英文首字母,F代表会计、金融师,L代表律师,R代表学术研究,E代表工程师、建筑师,M代表媒体从业者。此外,H表示在北京工作的香港人,C表示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人。

二、工作境遇:生与梦的情结纠葛

京港80后青年专业人士在父辈的耳濡目染中建构了本阶层的梦想:在社会结构中,个人可通过

掌握知识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伴随两地的发展,京港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句话形象地描述内地与香港近几十年的关系:“过去是大哥(港资)带着小弟(内地企业)走,现在是父亲(内地经济)拖着儿子(香港经济)走。”研究发现,两地青年出现了现实与梦想的背离,其背后既包含社会结构对青年一代身份认同影响的纵向视角,亦隐含“一国两制”指导下的政治文化对青年发展作用的横向思维。

(一)玻璃天花板:京港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

向上流动是个体由一个阶层渗透到另一个阶层,实现阶层地位的变化。教育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Sorokin,1959)。但是,调查显示,普遍受过高等教育的京港80后青年专业人士均认为,新一代的专业人士比上一代^①在社会上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其中,在香港调查中有66.7%的人持此观点,在北京亦有68.7%的人同意该观点(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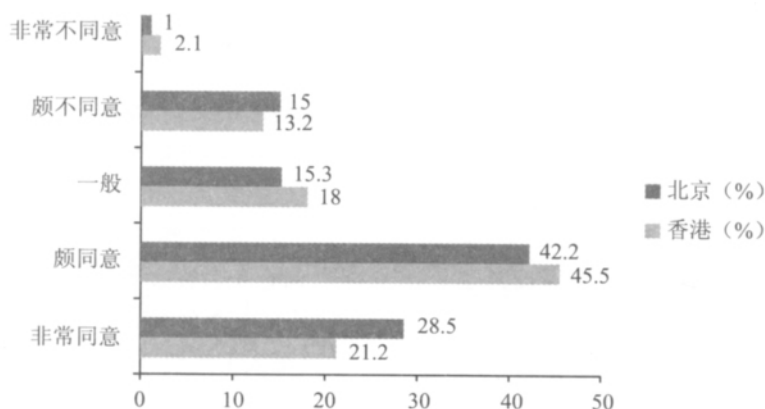


图1 与上一代相比,新一代青年专业人士缺乏向上流动机会

^① 调查发现,参与者对“上一代”这一概念的理解相对宽泛,并非特指某一年代出生的人群,而是指处于社会经济结构改变、创造发展奇迹的一代人。此外,北京和香港的青年专业人士对“上一代”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有两地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为什么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效用会减弱?阻碍青年向上流动的“玻璃天花板”是什么?香港和內地的青年专业人士都认为,“既得利益者”剥夺了青年向上流动的机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简单讲是因为上层的既得利益者,或是说游戏规则制定者,他们订下了一套规则。刚刚大家很激动地说上层给压力,下属不能扬言。其实问题在于,上层是一些 60、70、80、90 年代的新闻观。但是我们的新闻观及社会真是变得很快,快到他们其实追不上。(HKM6:某中文报刊记者)

这里 HKM6 所说的“既得利益者”是个相对的概念,在资源有限的社会中,当这一群体在分配中获得了好处,青年专业人士可获得的资源便相对减少。北京的一名律师 BJL2 认为既得利益者是 1975 年以前出生的一批人。

这批人(1975 年前出生的人)之后,很多机会都已经被人占了,律师行业的发展空间被极度地压缩。同时 80 年、81 年是中国的生育高峰,为了避开这个生育高峰对中国的冲击,大学开始扩招,法律专业也跟着扩充。本来就没有那么大的市场,又有这么多新人挤进来,所以竞争压力就更大了。导致了 75 年之后出生的那一批人机会少的可怜。(BJL2:某集团法律总监)

高考制度的恢复使 1975 年以前出生的一代人可以凭借自身努力,通过公平竞争,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在就业市场上占据有利的位置并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向冠春和刘娜(2011)研究发现,20 世纪 80、90 年代是我国历史上高等教育与个体向上流动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同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各行各业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制度力量创造了大量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在香港,正如 HKM6 从科层制的角度来分析,既得利益者是他们的“上司”,在年龄上大约是他们的父辈,即出生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一代人。他们能够通过读书考试获得更好的职业位置,凭借个人奋斗来提升自己社会阶层地位,即被广泛推崇的“香港梦”(黎熙元,2008)。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香港正处于经济迅速增长,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化的结构和过程效应互相作用,增加了就业机会。同时,港英政府新建两所大学,并将多所专上学院

(香港的专上学院类似国内的大专教育)升级为大学,大大增加了“上一代”接受高等教育并由此获得竞争优势的资本。可见,“上一代”是在经济环境与政治力量互动的过程中享受分配的成果成为“既得利益者”。

当他们成为既得利益者之后,开始通过制定“游戏规则”,固化其阶层边界,排斥其他阶层进入。这些规则便是资源不平等分配的合法化工具,特别体现在教育和就业制度上。BJL2 认为,大学扩招引发行业激烈竞争,从而导致向上流动的机会匮乏。1999 年中央制定了“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扩招计划。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香港,鉴于商界的催促和政治的考虑,衍生出高等教育加速发展政策。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附带了一些消极作用。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上大学,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就业中的相对优势减弱,文凭与就业的相关性减小。另一方面,寒门越来越难出贵子,北大清华这些一流大学里面,来自农村的、家庭贫困的学生比率年年递减,扩招并没有实现机会的增量,反而催生了机会的不平等。

此外,从 BJL2 的观点中亦可看出,80 后青年专业人士面临着就业“机会”减少,“行业的发展空间被压缩”。BJL7 是一名刚刚毕业,在京工作的律师助理,户籍制度阻碍了他的职业发展。

北京对外地(户口)律师限制比较大,职业方面不太好,得不到政策的支持,而且对外地(户口)律师有很严重的歧视。(BJL7: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以户口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承载着国家干预、个体机会、城乡隔离以及一线二线城市之间的区别。附着在户口上,北京不仅是一个城市、一个地点,也是一种特定的身份和市民的优越感,凸显出北京是一个以户籍划分资源和福利的城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既得利益者排斥竞争、巩固利益。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0.095% 抽样调查,在北京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外来人口占 4.55%,本市户籍人口占 19.73%。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香港的就业环境已大不如前。HKF6 从美国毕业,从事私募基金工作。

我 09 年毕业时,工作的选择少了很多,大部分公司都不请人。(HKF6:在香港从事私

募基金工作)

在金融危机来临时,既得利益者为保全自己的经济利益,选择将危机转嫁给青年,压缩机构的科层制,从而导致各机构大批裁员、大幅降薪,给予青年的发展机会和上升的空间不足。正是在这些不公正的制度推动下,两极分化日渐扩大,一方面既得利益者获得的资源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则是试图实现向上流动的青年被边缘化,从而在一个社会中“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便会遭到极大的挑战。

可见,京港80后青年专业人士之所以认为向上流动的机会不足是因为两地社会流动机制受到很多结构性限制,使他们难以打破玻璃天花板,突破阶层边界。泽林尼和科斯泰罗(2002)认为市场转型的平等化效应只限于转型的一段特定时期。在这一时期,统治阶层为了治理的需要,制定了各

种迎合经济发展的政策,孵化出一批既得利益者;他们继而与统治阶层结成联盟,形成阶层世袭的循环圈。因此,现阶段,社会变革已终结了早期社会阶层普遍受益的状态(程启军,2010)。

(二)假想的敌手:京港专业人士如何看待竞争

香港本土认同滋生的根源在于20世纪70年代为社会中下层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产生了大香港情结^①(任海,1997)。时至今日,内地的迅速发展使他们倍感压力。调查显示,香港青年专业人士更担心受到内地同行的威胁。如图2所示,在香港的调查对象中,有接近六成认为与内地专业人士存在竞争;反之,只有27%的北京专业人士认为与香港的同行存在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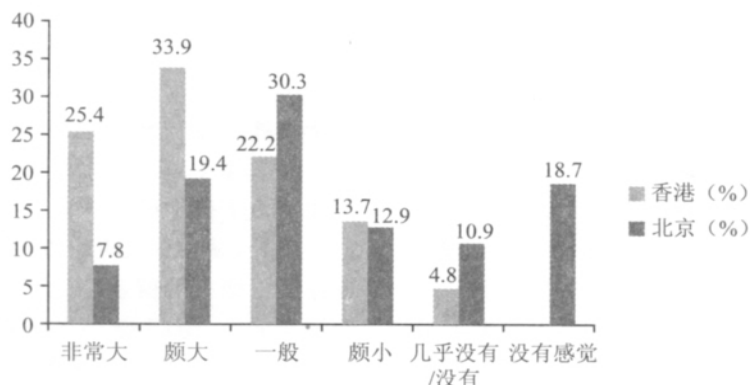


图2 香港与内地专业人士的竞争

访谈发现,呈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源于京港80后青年专业人士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差异。身份认同关注的是我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种认同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观察和审视之中逐步形成的(Mead,1934)。香港青年从某种角度而言需要一个内地同行的假想敌,作为与“自我”不同的“他者”,来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独特性和优越感。相反,北京青年基于国家民族观念,认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未将香港视为建构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他者”。

HKF4在美国修读了两个学位,现在香港从事期货期权产品,认为中央对香港的支持是“暂时

的”,一旦离开了,香港的发展堪忧。

因为经济暂时的好处是有中央关注,出入资本市场都要经过香港,要筹集外币一定要在香港做,或者想投资或汇钱到内地,在香港成立一间公司是容易很多,这些都是中央给香港的“绝招”。但这些不会永远存在,当人民币国际化时,香港就面临很大困难,好像以往香港航运业很旺,现在不用转口,已经不旺了。(HKF4:香港某公司从事金融工作)

在HKF4看来,目前香港在大中华经济圈中扮演桥梁作用以及贸易中转站这个定位是中央政府基于制度管理的“绝招”,一旦内地经济市场健

^① 大香港情结是相信以香港处事标准放诸四海而行之,并且有无处不在的优越感,这一情绪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资本和港式大众文化北上内地得到强化。

全,便会抛弃香港。可见,在“一国两制”的方针指导下,尽管和内地的融合已经成为香港经济政策的主调,但是与祖国的长久分离,在民众中尚存在对中央的不信任。这种观念完美地诠释了后殖民主义在香港发展而成的两个颇具代表性的理论:阿巴斯(Abbas,1997)的“消失论”和周蕾(1995)的“夹缝论”。根据阿巴斯(1997)的说法,香港的特定身份是因为香港的地位“不像是个确切的地点而像是一个中转的空间”,并将香港称为“消失的空间”。周蕾(1995)则认为,由于香港“解殖”的结果是“回归”中国,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质上也是一种帝国主义,香港处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夹缝状态,“解殖”的根本在于建立有别于中英的“第三空间”。因此,香港青年一代在与内地的交流中有所保留,在“过渡期”仍尝试以各种方式维持与内地的差异,而“香港过渡期文化结构”这一殖民地遗产依然是主导香港的意识形态(黄培烽,2010)。大香港情结促使他们努力保持相较于内地的优势。近来,陈云(2011)的“城邦论”一时喧嚣至上,《香港城邦论》一书在香港一时间洛阳纸贵,宣称香港要与内地保持适当的距离并强化自身特质,保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和纯正。这一论点与“消失论”、“夹缝论”一脉相承,但更加强调要发展香港的本土文化和本土意识。

这一意识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谷淑美(2002)指出,港英政府通过对香港社会意识形态的倡导和对某些媒体的授意而把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对立多次转译,从而把矛盾转移,并创造出新的本土意识。80后的香港青年没有殖民地成长的经验,中小学时便迎来了“九七回归”,接受香港公民教育,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已经从“根在内地”转变为“生在香港”,对香港有强烈的归属感,倾向于“以‘中国的香港人’或‘香港的中国人’自居”(吕大乐,2007)。时间上,香港全球化和现代化时期是与殖民时期重叠的(黎熙元,2005),很多专业人士有欧美留学的背景,这种位于中西交汇冲突边缘的处境,为香港青年专业人士的身份认同造就了一种

特有的“混杂性”^①。这种对认同边界的模糊化直接影响了他们对香港内地化的担忧。

从北京角度看,北京是大中华这一新兴经济体发展的核心,许多全球化企业都在北京设有办事处,也曾借助香港的中转力量,比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和壮大与香港专业人士的参与和付出密切相关。

因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一进来的时候,很多职员都是从香港过来的,做了几年后,他们都上升到高职位。而我们本地人其实也在慢慢向上升,对他们来说构成了一种威胁。(BJF8:某咨询公司高级顾问)

内地开始时不是用IFRS^②,所以很多partner是由香港派到内地。现在内地人都会用IFRS,觉得不再是香港人才能当partner。(HKF8:香港某证券公司)

可见,香港的专业精神推动了北京的经济变革。在北京的问卷结果显示,61.2%的青年专业人士认为香港同行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比北京高。这种变革体现为:提高同行的专业精神,香港专业人士在北京培训专业人才,或者北京人才南下香港,接受有系统的训练。另一方面,建立有效制度,香港专业人士将香港成熟的国际化规范推广至北京的行业建设,如HKF8提到的“IFR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引导北京的金融业走向国际化。近些年来,北京青年专业人士通过在全球资本和商品大潮中的历练,在北京职业市场越来越占据主动地位,他们的香港同行则逐渐占据外来的客位。如BJF3所言,较香港同行,北京80后青年专业人士更具有“本土化”优势。

我觉得在发展本土客户方面他们(香港同行)是越来越弱了,我想这也是他们为什么有危机感的原因。(BJF3:某投资公司投资经理)

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世界的目光都投射进北京这个有广阔经济腹地的城市,争相了解北京的文化特色。抢占北京市场,就相当于迈上占据中国

① 混杂性是指在外来文化影响下,本地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并改变自己,产生出新的文化形式或类型。

② IFR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简称,是全球统一的财务规则,是按照国际标准规范运作的财务管理准则。用于规范全世界范围内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的会计运作,使各国的经济利益可在一个标准上得到保护。

市场的第一步。在北京80后青年专业人士看来,香港同行的技术更多是为我所用,“要说专业的话,香港确实很专业,但我们已经逐步在赶上”(BJF8)。进而,由于现实与历史的落差,北京是香港一个特别重要的“他者”,是个最为直观的竞争对手。对正处于发展上升空间的北京,它的“他者”既有亚洲大都市、国际大都市,也有大中华圈内的香港、澳门、台北,还有沪深等国内大城市以及二三线城市,比较的空间和维度相对多元,因而京港青年专业人士对于竞争的指向和理解有所不同。

三、生活境遇:家与业的忧喜相伴

“成家立业”是每个青年都会面对的问题,职业性质使很多青年专业人士的工作与家庭不能两全。他们的生活被光鲜亮丽的工作所左右。鉴于跨境专业人士面临更为激化的工作与家庭平衡问题,下文将以这一群体的生活境遇为分析重点。

(一)地位恐慌:本土人士的生活境遇

研究发现,京港80后青年专业人士面临许多相同的境遇:工作时间长,78.9%和93.7%的北京、香港青年被访专业人士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了法定的40个小时,导致工作占用了很多人时间,无暇访亲会友,出现工作与家庭的不平衡。此外,巨大的工作压力甚至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出现“流产”、“过劳死”等现象。压力源于工时长,风险大,存在很多“不可控”的东西,如“公司政治”、“交易的不确定性”等。除了以上的客观原因外,青年专业人士在主观上也有不愿意停下来的因素。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维持“体面生活”的驱动,逼迫自己继续劳累下去。米尔斯(2006)将这种现象称为“地位恐慌”,并认为专业技术阶层希望通过教育、出生地和移民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声望。

两地青年专业人士生活境遇中的突出差异体现在对本土的归属感不同。香港80后青年专业人士中较少谈及逃离香港。据香港保安局数据显示,香港移民海外的人数由2001年的约10600人,跌至2011年的7200人^①。由于欧美经济持续疲弱、

内地和香港经济迅速发展,大量移民二代纷纷回港发展。在北京的焦点小组访谈中,除科研人员组外,其余各组均有超过50%的参与者表示未来5年内有可能离开北京,因为“没有归属感”,以BJM5为代表的参与者开始反思,“工作的城市也是你生活的城市,考虑换一个可以把工作和生活结合起来的地方”。问卷结果显示,参与者对北京最不满意的状况中位于前四位的依次是房价高、交通拥堵、生活成本高、环境差。他们选择留在北京的主要原因在于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职业环境较为规范,资源较为充足,发展机会相对较多。时下社会一面讨论“逃离北上广”,一面上演“逃回北上广”,青年人士处于一种艰难的选择中。事实上,两地青年这一差异的本质是相同的,逃离与回流、家与业的取舍体现了他们不愿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追求不断向上流动的机遇与空间。

(二)边缘性:跨境人士的尴尬与徘徊

京港两个城市都是典型的移民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和香港两地跨境业务越来越频繁。通过对在北京工作的香港人和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人进行焦点小组访谈可以透过京港不同的人才引进政策来了解跨境青年专业人士在两地的生活境遇。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将北京城市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自2009年6月起,北京启动实施“海外人才集聚工程”。由于香港拥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先进的技术知识、完备的法律制度和发达的咨询服务,其特殊的优势在北京的“引智”^②工作中发挥着重要功能,早在2003年北京便实施专门针对港澳台同胞的政策——《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高级人才来京工作有关政策的实施意见》。同时,香港为提升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先后实施“海外内地专才输入计划”、“内地学生留港工作计划”、“内地专业人才输入计划”等多项政策吸引内地及境外人才。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专业人士有很多在香港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拥有港式教育下认同的专业技术,同时了解内

① 港人移民海外处十年来最低水平。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1-02/05/c_121051712.htm, 2011-02-15.

② “引智”是“引进国外智力”的简称,就是指通过对外开放的形式,引进国外的优秀人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等活动。摘自孙继虎、刘静:《试论邓小平引智理论的科学体系》,载《社科纵横》,2003年第6期。

地的工作文化,是在香港从事与内地合作项目的不同进行比较。
二人选。表 2 针对京港两地相应的人才引进政策

表 2 京港人才引进政策比较

		北京	香港
政策出发点		为鼓励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高级人才参与北京现代化建设,促进首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吸引内地优秀人才和专业人才来港工作,以满足本港对人才的需要,支持香港在经济及其他领域上的发展,提高香港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并透过新计划,尽量划一内地居民和外国公民来港就业的条件
人才要求	素质	重要工作岗位任职的高级人才	必须拥有香港缺乏或无法即时提供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引进途径	由雇主提出申请	先有雇主聘用
	行业和数量限制	倾向高新技术行业,不设限额	不限行业,不设限额
人才引进政策力度	工资待遇	“海聚工程”一次性奖励 100 万人民币	无特别说明,但薪酬福利(包括入息、住房、医疗和其他附带福利)须与当时香港专才的市场薪酬福利大致相同
	相关社会保障	在购房、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享受本市市民待遇 “海聚工程”明确为专业人士在税收、户口、签证、医疗、社保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享有和香港本地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 享有基本免费的医疗保险;人才子女享有九年免费教育,香港教育和专业证书与国际接轨; 同本地居民一样,在港创业不征收增值税、销售税或资本增值税,只有在香港赚取的收入才需课税
	家属随同	可携配偶和子女	配偶及十八岁以下的未婚及受养子女可以“受养人”身份申请来港居住
	居留权	签发《北京市工作居住证》	通常在港连续居住满七年,可获得香港居留权
人才引进机制	政策权威性	属于行政性政策,不是立法性政策	经香港立法会批准通过,权威性较强
	主管部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入境事务处
	程序完备性	无监督机构	由“输入优秀人才及专才咨询委员会”等独立的人才评估、监管机构
	相关证件	《港澳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或《港澳同胞回乡证》	《往来港澳通行证》

资料来源:《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高级人才来京工作有关政策的实施意见》、“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北京海外人才聚集工程”

由此可见,两地政策体现如下特征:一方面,不同人才间存在不均衡现象。香港政府已意识到内地专才与海外专才的不同待遇,并有意进行调整。

北京的人才引进政策却通过高额的资金奖励,将海外人才与本土人才严重割裂,以致难以形成整体竞争优势,甚至会出现“零和博弈”,同时迷信“外来和

尚会念经”,在考评机制、科研环境、福利待遇等方面“过度区别对待”,极有可能造成原有人才的“挫败感”(王捷民,付军政,王建民,2012)。另一方面,人才的供求关系由不同的主体决定。香港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与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显示出市场主导性。相反,北京则更侧重于显赫的头衔、较高的职位、突出的成果,呈现为政府主导性。

与以前的体力移民不同,专业人士属于精英移民,他们的优势在于人力资本中的知识。朱力(2010)认为,大部分具有高人力资本的移民对迁入地有认同感、归属感。但调查发现,这些专业人才因彼此之间缺乏共同经历,存在语言障碍,同时受文化、政治观念等其他因素影响,大家交往存在心理距离,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统计,2008年度约21.82万香港居民曾经在内地工作,其中40%是专业及辅助专业人员,除广东省、上海市以外,香港人优先选择到北京移居和工作(何柳,2009)。但在京的香港专业人士普遍存在融入障碍。HKF3在澳大利亚毕业,目前在一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他列举了自己朋友害怕被内地人歧视所采取的策略。

我的香港朋友比较极端,在内地是不会说自己是香港人,只说是广东人。因为始终香港人与内地人之间存在隔膜,如果想融入他们,你说自己是广东人可能还有机会。(HKF3:某会计师事务所)

这个例子或许极端,但说明香港人有融入内地的愿望,他们身份认同的迷茫不仅是自我主动与他者比较形成的,同时受他者的反馈影响。尽管香港已经回归,但在内地人眼中,“香港人”被制度安排了身份,他们是不同于自己的类别,这便是“隔膜”所在。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不同人群的聚居可略见一斑,在北京,港澳台及外籍人士多聚居于东部的朝阳区。同时“一国两制”中求同和存异的碰撞使在北京的香港人往往感到“身份尴尬”。一位在香港驻京办工作的职员 HKH2 表示:

在北京这个部门,身份很尴尬。一国两制下,我们的工作似乎等同“领馆”,但又在一国之内,自己很难找平衡点。每天都在做一些尴

尬的事,在身份上仍在摸索。(HKH2:香港驻京办)

这种“平衡点”某种程度上便是求同和存异的平衡。如 HKH2 所介绍,香港驻京办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与只在北京设有大使馆,而在香港特区没有代表办事处的外国外交使团,商讨免签证入境事宜。此外,还需处理赴港探访、工作、投资、接受培训、居住和就读的入境申请^①。这些职能与其他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截然不同,表明了香港与其他省份在政治身份、享受权利等方面的区别。基于身份的差别待遇,香港人与北京人在社会福利资源分配中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香港专业人士的薪水发放方式等同于外籍人士,他们无法享受医疗保险制度等社会保障政策。可见,内地引入人才的方式是受近代“西学东渐”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影响,相比直接引进外籍和香港专业人士,内地更青睐海归的本地专业人士。

香港自2003年7月15日起实施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至2011年底,共吸引57000余名内地专业人士,主要行业包括学术研究和教育、艺术、文化及商业贸易^②。但是,在香港的内地专业人士表示很难真正地融入香港社会中。BJC7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现在香港某大学任教;BJC1在香港某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现为香港一名执业律师。

在这边真正融入是非常难的。其实香港的文化和内地、美国的差别、区别是相当大的。“融入”不仅仅是交朋友,还包括是否参与政治或者以香港人的方式生活和发展。香港本质上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这边的政策歧视性是非常明显的,很多事情,包括就业、入学、福利,对内地人的歧视是非常明显的。(BJC7:香港某大学助理教授)

香港这边教育资源的分配还是非常不公平,我要去最好的学校,就必须满足他们的条件,比如是不是教徒等等。我尊重他们的宗教,但也不能为了孩子上学,就说我信上帝吧?(BJC1:律师)

上述观点反映了香港对内地人的“政策性歧视”和“资源分配不公”,这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

① 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北京办事处. http://www.bja.gov.hk/chs_s/pgm_zhineng_s.htm.

② 香港入境处二零一一年工作回顾. <http://www.immd.gov.hk/chtml/20120120.htm>.

一是植根于香港人心目中对内地移民的歧视。香港本土意识的建立是基于与乡土中国的对立,“内地移民”的负面特征已被刻板印象化,青年专业人士这批精英仍然受“内地移民”这一称谓的污名化影响。一部分激进的香港人认为内地人的大量涌入正在侵蚀香港的经济、文化环境,甚至认为“这个城市正在死亡”(叶伟民,孙毛宁,2012)。二是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陈国贲(2008)认为,在港工作的内地专业人士的边缘性使他们在西方现代个人主义和东方传统家庭主义的两极之间取得一个心理上的平衡点——既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也可能在有需要的时候很快回到家人身边。这种边缘性既是内地专业人士的竞争优势,又使其徘徊于香港与内地、职业发展与传统家庭的选择之间。

四、结语

2012年,“D&G拍照事件”、“双非孕妇”、“内地游客赴港自驾游”、“游客地铁进食”、“蝗虫论”等一系列事件的涌现,映射了在内地与香港贸易日趋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民间文化冲突的不断升级。双方的争论暴露出两地民众对彼此文化等领域的陌生。因此,考察80后京港青年专业人士在工作、生活领域面临的相同或不同的处境时,必须放在内地和香港关系这个更大的语境中去理解。京港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复杂和不平衡的,在互动中掺杂着东西方价值观的碰撞,大中华主义和大香港情结的冲突。研究发现,京港80后青年专

业人士均认为自己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为保持自己的地位必须在家与业中作出取舍,同时跨境人士对工作城市缺少归属感,香港青年专业人士认为内地同行是自己的竞争对手。本文认为,导致两地青年差异性的原因在于认同感的无力,包括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群体认同以及民族认同。这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密不可分,在北京,“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得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文化的改革略微落后;而香港在殖民结构中未被启蒙,却在经济过早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现代性的落差”(许宝强,2009)。因此,京港双方需重视民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借助经济发展的平台,促进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以经济依存带动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民族认同。同时,专业技术阶层是新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城市经济、文化、政治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80后专业人士对“成功”、“财富”等一系列炫目词汇的迷恋使其在判断城市文化走向上处于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从而在京港城市文化中留下了浮躁、尚富的烙印。此外,80后一代经历了“一国两制”政策下,京港双方互相磨合、彼此认识,进而实现真正融合的时期,对这一代青年专业人士的研究可为进一步完善“一国两制”相关配套政策提供翔实的资料。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京港政府应研究青年专业人士未来提升发展的有效途径,创造良好的行业环境,注重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举办多种交流活动,进而推动这一群体在实现个体价值的同时,成为京港融合的重要黏合剂。

[参考文献]

- Abbas, A. (1997).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 F. I. N., Jowett, A. J., Findlay, A. M., & Skeldo, R. S. (1995). Discourse an migr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Interviews with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20, 342-356.
-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 W. Morris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Sorokin, P. A. (1959). *Social and Cultural Mobility*. The Free Press. p. 133.
- 陈国贲. (2008). 内地专业人才在香港的社会适应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网站, <http://www.cpu.gov.hk/english/documents/new/press/20080601%20HK's%20Professional%20Immigrants%20from%20Mainland%20China%20and%20their%20Strategies%20of%20Adaptation.pdf>.
- 陈云. (2011). 香港城邦论. 香港: 天窗出版社.
- 程启军. (2010). 阶层间封闭性强化: 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新趋势. 学术交流, 1, 118-122.
- [美]丹尼尔·贝尔(1997). 高銛, 王宏周, 魏章玲译.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谷淑美. (2002). 文化、身份与政治. 载谢均才. 我们的地方、我们的时间.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 何柳.(2009).2008年近22万香港人到内地工作,逾77%为雇员身份,新华社.http://www.gov.cn/jrzq/2009-02/09/content_1225805.htm.
- 黄培烽,许煜.(2010).80前后超越社运、论述与世代的想象.香港:圆桌精英出版社.
- 黄洪基,邓蕾,陈宁,陆烨.(2009).关于“80后”的研究文献综述.中国青年研究,7,5-13.
- 峻焕.(2004).香港忧思录.香港:共和(香港)出版有限公司.
- 黎熙元.(2005).全球性、民族性与本土性——香港学术界的后殖民批评与香港人文化认同的再建构.社会学研究,4,189-206.
- 黎熙元.(2008).后转型期香港的社会阶层流动特征及对社会意识演变的影响.学术研究,9,69-76.
- 吕大乐.(2004).香港中产阶级.开放时代,2,130-135.
- 吕大乐.(2007).从港人身份认同看回归十年.同舟共进,7,14-15.
- 毛哲山.(2008).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困境和发展趋势.人文杂志,2,182-186.
- [美]C·莱特·米尔斯.(2006).周晓虹译.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加]迈克尔·布雷克.(1988).越轨青年文化比较.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强世功.(2010).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任海.(1997).看的辩证:展览橱中的香港.二十一世纪,41.载刘青峰,关小春.转化中的香港:身份与秩序的再寻求.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单光鼎.(2008).香港中产阶级:香港社会的中坚力量.广东社会科学,4.
- 王捷民,付军政,王建民.(2012).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与高端人才发展:实践与对策.中国行政管理,3,84-87.
- 向冠春,刘娜.(2011).我国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嬗变.现代教育管理,1,4-7.
- 许宝强.(2009).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义的危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许叶萍.(2008).体制内与市场化:青年的知识价值在两类体制下的不同实现.中国青年研究,8,32-40.
- 叶伟民,孙毛宁.(2012).焦虑的香港在纠缠——反内地、“蝗虫职业”之后.南方周末,02-24.
- 于铭松.(2010).对香港中产阶层的社会特性的分析.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3,38-43.
- 于卫军.(2008).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特征探析.中国青年研究,11,68-71.
- 泽林尼,科斯泰罗.(2002).关于市场转型的争论:走向综合?载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周蕾.(1995).写在国家以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朱力.(2010).中外移民社会适应的差异性与共同性.南京社会科学,10,87-93.
- 邹崇铭.(2010).从机会结构看80前与80后的社会运动.黄培烽,许煜.80前后超越社运、论述与世代的想象.香港:圆桌精英出版社.

(责任编辑 侯珂 责任校对 侯珂 宋媛)

Born in 1980s: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edicament of Young Professionals in Beijing and Hong Kong

LV Dao-yu, WANG Xi-yi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career development, upward mobility,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young professionals who were born in 1980s, in both Beijing and Hong Kong, under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of “Two system in One Country.” Adopting mixed methodology,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young professionals in both cities lack of upward mobility in their career path, and they choose hard working as a major coping strategy for overcoming the “status panic”. However, young professionals in two citie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whether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other city would bring in competition and threatening to their own status. This article also illustrates the difficulties of young professional working cross-border to be more included and involved in their guest cities. This predicament of young professionals results from the differences of the histories, cultures, political systems,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two citie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both cities need promote their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and construct deeper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both cities based on economic connec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Post-1980s; young professional; middle class; upward mobility; career development;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social participation.